

# 人类文明样态历史演进视域下的生态文明思想

陆雪飞, 张丽

(江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无锡 214122)

**[摘要]**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是马克思所阐释的“人与自然的感性对象性关系”的逻辑延续和当代表达, 为世界工业文明转型及全球生态治理贡献中国智慧。目前, 我国正积极地开启出一种新文明类型(超越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可能性, 促进全球生态治理和世界生态文明建设, 回应西方“元叙事”, 破除“生态威胁论”, 建构“中国叙事”, 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国担当。

**[关键词]** 人类命运共同体; 生态文明; 生态共同体; 数字资本

**[中图分类号]** A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73(2023)04-0013-10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是马克思生态哲学思想的逻辑延续和当代表达。<sup>[1]</sup> 马克思哲学或马克思主义不仅具有其相应的自然理念, 而且这一自然理念绝非是普罗米修斯主义意义上的工业自然观, 因而马克思绝非是一个站在工业资本主义或资本主义的现代性立场的思想家, 因而马克思绝不是完全无视自然生态的征服主义者, 也不是一个反生态意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者。这是我们的基本立场和基本看法。

## 一、文明样态及其自然观基础的历史演进

依据不同的划分标准, 人类社会的文明样态及其历史演进有着多种多样表述。如果我们立足于人类文明历史演进的广阔视野中, 把“生态文明”作为继“工业文明”之后的全新文明样态, 就必须抛弃现有的多样化划分标准, 以不同历史阶段的人类自然观及其历史嬗变为基础, 把人类社会的文明样态划分为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等主要类型或阶段, 从而呈现出特定的自然观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特定文明之间的历史性关联。

### (一) 文明样态的界划依据

目前, 国内理论界在划分文明样态时, 依据的标准是多种多样的。

首先, 人类社会生活的领域, 从总体上大致可以划分为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两大领域。据此, 人类社会的文明相应地就可以划分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人与自然的关系与人与人或者自我的关系是交织于一起的。

**[收稿日期]** 2023-02-28

**[基金项目]**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BKS007)的阶段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陆雪飞, 江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张丽, 江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2 级博士研究生。

其次,以社会生活的不同结构层次来看,把人类文明划分为不同层面和不同领域的文明,比如党的十八大报告根据社会建设的五个方面——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把社会文明建设划分为经济文明、政治文明、文化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建设五个方面。

再次,在唯物史观的理论体系中,以生产工具为依据对经济时代的划分,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理解为对人类文明的划界。依据生产工具的历史演进,唯物史观把人类的经济时代划分为不同的历史类型,即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在对工业社会或工业文明的反思过程中,生成了“后工业社会”或“后工业文明”的概念。如此一来,同样是依据生产工具——只不过是外延放大的了的生产工具——的历史演进,人类文明的历史演进就变成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的历史序列。

此外,我们还可以依据不同的民族、信仰或不同的地区与国家对文明的历史和文明的样态进行多种多样的划分,比如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等等。

## (二)自然观:文明样态的界划依据

大致说来,当下学界对人类文明样态的划分主要依据地就是以上三种划分标准。但是,这三种划分标准以及依据这三种标准对人类文明历史样态的划分都有一定的局限性:

首先,就第一、二种标准和划分结果而言,它们主要表现为横向或断面式的,是就一定历史时期的特定人类社会的不同领域、不同层次做出的,从而把人类文明的样态划分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或者经济文明、政治文明、文化文明、社会文明与生态文明。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划分中,生态文明无法出场;在经济文明、政治文明、文化文明、社会文明与生态文明的划分中,生态文明虽然已经出场,但它依然被局限于社会生活中的某个局部层面,而没有被置于人类社会宏大历史演进的序列中。

其次,就第三种划分标准或划分结果而言,人类文明的宏大历史叙事已经呈现出来,但是由于它是依据生产工具所做的划分,因而生态文明的历史定位是无法确定的,或者说是无法直接出场的。这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传统的唯物史观的理论视域中,作为对工业文明之超越的人类社会文明样态,唯物史观是以第三大社会形态或共产主义社会的形式出现的;换言之,生态文明的概念尚未出场。也就是说,第三大社会形态或共产主义社会虽然已经内在地包含了生态文明的本质规定性,虽然它已经内在地包含着人与自然矛盾的和解——马克思曾经称之为“自然主义”,但作为这一矛盾之和解的生态文明概念并没有生成;第二,在20世纪发生的对工业社会的诊断中所生成的后工业文明,虽然也包含有生态文明的内涵,但后工业文明毕竟是一个比较笼统的表述,它也并不直接等同于生态文明。实际上,后工业文明内在地有包含着丰富的类型和内容。比如,从人类活动所传递并依赖的信息量大小,人们把后工业文明称作是与传统工业文明不同的信息文明,在这里出现的是工业文明与信息文明的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说,后工业文明是指信息革命,其最突出的特点是知识的迅速传播和所谓的知识和信息的“大爆炸”或“大数据”的快速传播。

再比如,从信息传播方式、传播手段和传播平台的差异,人们又把工业文明与后工业文明的不同称之为电气文明与互联网文明的差异。又比如,从文明的生态影响与生态后果的不同,人们把后工业文明称作是不同于工业文明的生态文明。在这里,生态文明虽然已经出场,但它仅仅是依据工业文明与后工业文明所造成的不同生态后果而言,因而同样也不是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宏大叙事的

角度,对人类历史文明样态的划分。

综上所述,如果我们要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宏大叙事的视角,对人类文明的历史演进做出总体性的分析,就必须依据一个全新的界划标准,对人类文明的宏观历史演进做出全新的分类,并据此呈现出人类文明历史演进的必然性与规律性。我们认为,这一划分标准只能是人与自然关系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呈现,即只能依据不同历史时期的人类自然观差异,划分出人类文明的不同类型及其历史演进序列。我们的确可以依据不同的标准对文明做不同的类型和阶段划分;每一种划分都具有其合理性和重要性,适应于不同的理论研究和现实性的需要;如果从文明历史演进的大尺度来看,迄今为止,我们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以生产工具为标准划分经济时代的做法,最接近于或者最适合于合理界定人类文明样态的当代进展。但是,在这个划分中,生态文明只是被归属于后工业文明这个大概概念的表述中。事实上,后工业文明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的文明,根据不同的标准和特点可以表现为信息文明、互联网文明,等等。生态文明只是其中之一。只有在这样的文明序列中,生态文明才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不同于此前文明,尤其是不同于工业文明的独特阶段和独特类型。也只有在这一历史序列中,我们才可以说,在前后相继的人类文明发展的不同阶段中,任何一种文明类型都本质性地表现为人们对待自然的不同态度,或者说,不同的文明类型文明样态,都不仅奠基基于特定的自然观,而且也表现为不同的自然理念。

## 二、自然观的历史演进

如果我们借用中国哲学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传统表达,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即“天人混沌”的原始文明阶段、“天人合一”的农业文明阶段、“天人对立”的工业文明阶段,并正在走向“天人和谐”的生态文明阶段。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历史演进总是对应于特定的人类自然观,这种对应绝不是历史的巧合和历史的偶然性,而是存在着内在的关联。这种关联就在于:特定的人类社会文明总是与人类特定的自然观密切相关,或者说,人类对待自然的一定态度与方式,直接催生出一一定的社会文明。

首先,原始文明自然观。原始文明,乃是人类文明的第一个阶段,大致可以追溯到大约四百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这一阶段又可以称作原始采集渔猎社会。当我们把这一阶段称作原始采集渔猎社会,这是就其特定的生产工具以及与其相适应的生产方式而言的。在这一时期,由于生产工具极为简单,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人们只能依靠植物根茎的采集和简单的渔猎,并借助于集体力量的合作才能谋生。这种社会状态及其生存方式,是与当时人们所处的自然环境以及这种环境对人的影响力密切相关的,同时也孕育出了人们对待自然的态度和看法。如果依据人们与自然的特定关系以及据此而形成的对待自然的方式——它同时也是人们的生存方式——来看待原始采集渔猎社会,那么,我们就同时也可以把这种社会阶段以及与此相关的文明时期,成为原始文明。作为人类最早的文明阶段,人类的生存活动完全被控制在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过程中,人淹没于自然之中并成为自然的奴隶。这种原始自然观,既是特定自然力量对人的关系的反映,它反过来也左右了人类活动的方式,从而创造出人类社会文明的第一种类型,即与“天人混沌”相关联的原始文明。

其次,农业文明自然观。农业文明是人类从自然界中初步分离出来,并试图通过改造自然界的方式而利用自然的一个文明阶段,它可以追溯到距今约1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如果基于特

定生产工具的使用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生产方式,人类社会发展的这一形态可以被称为农业社会。人类对待自然的方式就是人类存在的方式,即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生活方式。就此而言,铁器的使用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它一方面使得人类自身对自然能力的驾驭产生了质的飞跃,但另一方面自然不仅依然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根基,而且自然本身依然具有对人而言的强大威慑力。因此,对于农业时代的人们而言,自然界乃是人类生存的生命所在,人类的生存与自然界的存在乃是同一的,由此生成的乃是农业社会的自然观。如果我们依据农业社会的自然观来看待人类对待自然的方式以及与此相关的人类生存方式,我们又可以把农业社会的文明称之为农业文明。就此而言,农业文明不仅是指基于农业生产方式所创造的全部劳动成果,而且同时也意味着一种新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范式。就这一范式而言,它既包含有人对自然的有限改变,又包含着人对自然的依赖与膜拜。原始农业最初仅是对“自然的模仿”,即使在后来发生的“火耕”、“刀耕火种”、“耜耕”等农业生产阶段,原始农业阶段的人类还没有足够的能力对自然施加强有力的影响,人类活动对自然的干预十分微弱,人类还奴隶般地任自然任意摆布,对自然顶礼膜拜。

再次,工业文明自然观。在以18世纪的英国工业革命为标志的人类现代化进程中,人类迎来了现代文明——工业文明。工业文明是迄今为止最有活力和创造性的文明,同时也是唯一一个依靠经济不断增长而存在的文明样态。工业文明时代的到来,是与以蒸汽机为基础的机器生产工具的大规模采用分不开的;作为一种替代人力或自然力的强大力量,它意味着人类与自然关系的颠覆性变革,人类由自然的奴仆第一次变成了试图征服自然的主人,并取得了巨大的物质财富,规模化大生产以及随之而来的高人口增长、高生活消费,使商品与财富急剧增长;人类试图成为自然的主宰,并无限度的向大自然索取,由此导致了地球自然资源急剧消耗,环境污染日趋严重。工业文明阶段的人与自然的失衡和矛盾,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为严重和尖锐,产生的问题也日益复杂多样化。20世纪中叶以后,因人类对自然的大规模的污染与破坏,以及掠夺性地开发自然资源,自然开始“反抗”,这也引起了人类的反思。当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被打破时,真正的灾难就开始了。

究其根源,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也由此开始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对自然界的支配能力与改造能力,同时开始滥用人对于自然的开发能力,结果便是人类生存于其中的自然界开始惩罚人类。近250年的工业文明,不仅极大地激化了人与自然的矛盾,不断地呈现出自然的界限,同时还造成了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分化与对抗,日益呈现出社会生活的界限。如果人类社会的工业化车轮得不到有效遏制,如果不能扭转工业文明的强制性“进步”,如果自然的界限和社会生活的界限被彻底突破,迄今为止整个人类文明发展所取得的全部成果将毁于一旦。这是一个与人类生存命运息息相关的重大问题,它呼唤着人类社会文明样态的转型,呼唤这生态文明社会的到来。

### 三、文明样态的嬗变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工业文明的产生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同时也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资本批判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出场路径,对资本形态演变历程进行唯物史观说明,这是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给自己提出的一个理论任务。然而,在该手稿中,由于必要知识的缺乏,马克思还只是依据经济学说史的历史线索,即依据从货币主义和重商主义、重农学派到国民经济学的理论进展,借助于对私有财产主体本质的追问,通过对劳动何以被确立为私有财产的本质,即借助于劳动价值论被初步确立为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前提,从而间接性地说明了工业资本

是何以战胜封建地产的,即工业文明是何以战胜了封建的农业文明的。但是,对这一问题的真正细致而全面的说明发生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正是在该书中,马克思借助于作为唯物史观哲学范畴的“分工”,即“自发分工”的理论工具,不仅说明了异化劳动何以发生的机制,而且进而借助于“自发分工”和“异化劳动”历史性演进,展示了私有财产的历史演进,以及在这一演进过程中工业资本是如何战胜封建地产,从而成为统治世界的普遍性原则的。按照马克思的理论逻辑,这一过程大致经历了私有财产的萌芽、居于主导地位的私有财产关系、以土地形式存在的不动产的私有制——马克思称之为“真正的私有制”、以“等级资本”的形式存在的“同业公会的动产”、工场手工业资本等历史形式,从而在机器大工业时代表现为作为私有财产现代形式的工业资本。<sup>[2]583</sup>在这一逻辑进程中,马克思始终是依据“自发分工”的历史演进来说明私有制存在形式的历史嬗变的。

首先,“自然分工”的扩大与“部落所有制”。所谓“自然分工”,乃是指由于自然因素而导致的分工。在这里,自然因素表现为两个主要方面,即就人而言的性别、身体素质等因素,以及不同的自然环境因素。实际上,在最初的家庭形式中,男女之间所分别从事的不同活动——如狩猎与植物根茎的采集之间的区别,主要地就是根源于就人而言的自然因素的差别。所谓自然分工的扩大,就是作为自然分工而呈现的男女之间活动形式的差异,表现为不同氏族或部落的生存活动。换言之,原来有不同的人所从事的活动变成了不同氏族或部落的谋生方式。当恩格斯讨论社会分工的历史,并把“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称之为“第一次社会大分工”<sup>[3]179</sup>时,他所表达的实际就是农业与畜牧业的分工;而这一分工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自然分工的扩大”。马克思指出:与自然分工的扩大相适应的必然是一定的所有制形式;马克思把这种所有制称之为“部落所有制”。从本质上来说,这种部落所有制是一种公有制,但同时它也已经包含着私有制的萌芽,或者表现为私有制的雏形。<sup>①</sup>

其次,“农业”和“手工业”劳动的分工与封建的或“等级(资本)”的所有制(日耳曼)。所谓“农业”和“手工业”劳动的分工,马克思所指称的乃是在日耳曼人征服了希腊罗马文明之后,在欧洲广阔的内陆地区建立起封建主义的生产活动方式和相应的政治国家制度的基础上,所发生的一次重要社会分工。这一分工的发生依然是与城市与乡村的分离有关的。因此,马克思一方面指出:古代世界的起点是城市,即古希腊罗马文明是在围绕并依托地中海沿岸的城市发展起来的文明,而中世纪的起点则是欧洲广阔的内陆乡村,即封建主义的经济政治文明是在欧洲内陆的乡村地区发展起来的。另一方面,马克思同时又把封建时代的全部生产生活活动再度划分为两个部分,即城市与乡村,并据此分析当时的社会分工形式,从而把中世纪的社会分工表述为城市与乡村、“农业”和“手工业”分工,进而展示所有制(私有制)形式的新的存在形式——封建的或“等级(资本)”的所有制。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在“私有财产关系”一部分就曾经简要分析了与封建地产相关的“租地农场主”是如何被工业资本家所取代的。<sup>[2]173-177</sup>但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则抛开了这一分析线索,主要围绕与行会手工业相关的“等级资本”展开分析,展示了等级资本是如何由于行会手工业与商业的分离,逐渐被作为私有制存在形式的商业资本所取代,并进而通过

① 正像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分工从最初起就包含着劳动条件——劳动工具和材料——的分配,也包含着积累起来的资本在各个私有者之间的劈分,从而也包含着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裂以及所有制本身的各种不同形式。分工越发达,积累越增加,这种分裂也就发展得越尖锐。”(《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9页)。

对工场手工业以及工业资本的分析,说明了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的生成。<sup>①</sup>

再次,“商业”和“生产”的分离与中世纪的“活动资本”的所有制。所谓商业与生产的分离,乃是行会手工业与商业的分离。这一分离依托于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即随着行会手工业的发展以及不同地区之间交通状况和治安状况的改良,产生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即商人阶层。他们运用自己所拥有的私有财产即货币,购买行会手工业的产品,并把它们销售到周边的城市与乡村。在人类分工活动的历史上,这一分工具具有重要意义。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是一个“有决定意义的重要分工”,“它创造了一个不再从事生产而只从事产品交换的阶级——商人”<sup>[3]185</sup>。实际上,这一分工之所有是一个有决定意义的分工,并不只是由于商人的出现,而是由于商人的出现所导致的私有财产存在形式的重大变化,即与“等级资本”完全不同的“活动资本”——“商业资本”的出现。等级资本之作为等级资本,乃是由于它深深地表现出封建时代的等级制度的烙印,因而更多地具有封建性的色彩,它还不是真正意义的资本;而“商业资本”则摆脱了等级资本在物性和社会关系意义上的封建色彩,它是一种单纯地“以货币来计算”的资本,从而摆脱了它的物性存在形式,即不再与某种具体的特殊劳动活动直接相关;恰恰相反,它却是计量特殊劳动及其具体劳动产品的尺度,因而与现代意义上的资本具有直接的同一性。就此而言,商业资本的出现,乃是作为现代意义上的资本诞生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环节。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不仅在一般意义上把动产的出现看做是真正的私有制的开始,而且在特殊意义上把商业资本的出现看做是现代意义上的资本的生成,即作为商业资本的活动资本具有了现代资本的一般性质。<sup>②</sup> 随着商业的发展以及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所发生的一个日益广阔的贸易市场的形成,提供劳动生产力并因而生产出更多的商品就成为一个必然的要求。这一要求直接地针对着行会手工业,但是由于行会手工业的传统观念的约束,从根本上改变手工业的生产工艺,在当时遭到行会师傅的抵制。对此,马克思有明确的分析,并基于这一分析,马克思指出了越出行会手工业并响应商人诉求的另一个领域,即纺织业。由于纺织业被排除在行会手工业之外,并且不需要复杂的技术,因而引入新的劳动方式以提供更多的劳动产品,就首先在这一行业中发展起来。工场手工业生产应运而生。

最后,机器大工业与垄断资本。工场手工业的出现不仅是商业与手工业分工的必然结果,它同时也产生了另一个重要的结果,即“工业资本”的出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并没有对工场手工业发展的历史进行细致的分析,马克思只是在一般意义上把工场手工业的出现作为工业资本诞生的历史环节。我们知道,只是在后来的《资本论》中,马克思才进一步结合分工与协作深入分析了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开始——只有建立在分工与协作基础上工场手工业生产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开始。<sup>[4]</sup>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作为工业资本诞生的历史环节,马克思对工场手工业和工业资本的分析主要集中于对工业资本(包括商业资本)对等级资本的

① 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已经认识到:“封建地产”是不发达的、不公开的私有财产,是还没有完成的资本,它必然要被“发达的私有财产”,即“资本”所取代。正像马克思指出的那样:“从现实的发展进程(……)产生的结果,是资本家必然战胜土地所有者,也就是说,发达的私有财产必然战胜不发达的、不完全的私有财产的胜利,……。那些对完成的自由工业、完成的纯洁道德和完成的博爱商业的多少有点预感的国家,企图阻止地产资本化,却完全白费力气。与资本不同,地产是还带有地域的和政治的偏见的私有财产、资本,是还没有完全摆脱周围世界的纠缠而达到自身的资本,即还没有完成的资本。它必然要在它的世界发展过程中达到它的抽象的即纯粹的表现。”(《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6—177页)。

② 马克思指出:“随着摆脱了行会束缚的工场手工业的出现,所有制关系也立即发生了变化。越过自然形成的等级资本而向前迈出的第一步,是由商人的出现所促成的,商人的资本一开始就是活动的……可以说是现代意义上的资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1页)。

超越分析,以及商业资本的发育和与之相关的金银管制政策的变化<sup>①</sup>如何进一步推动了工业资本的成长。在这样的相互作用关系的推动下,等级资本走向消亡,而与之相适应的则是现代意义上的资本的生成并日益取得支配地位。工场手工业的不断发展进一步推动了商业贸易在区域广度上的扩大与膨胀,与之相适应的乃是世界性市场的开拓。与此有关的历史事件就是新航路的开辟与南美洲大发现;而这一事件反过来进一步要求工场手工业提高劳动生产力。由于这一时期的工业生产和商业贸易集中于英国一个国家,因此如何进一步改进生产工艺和提供劳动效率就成为一个更为突出的现实诉求。为了满足这一诉求,集中于英国的工场手工业生产开始逐步引入了各种自然力,并最终促成了蒸汽机的发明,从而导致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建立起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工业——机器大工业;与此相适应的则是作为现代意义的私有制形式,即工业资本的全面胜利。<sup>②</sup> 马克思考察了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将走向垄断。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领军人物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认为,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正处于大转折时期。一般说来,“大转折”一词,指关键的过渡时期,或者个人或社会的转折点。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该词意指由历史条件变化而引发的社会转型问题。20世纪80年代,环境地理学家伊恩·伯顿和罗伯特·凯特斯曾经使用“大转折”这一术语来试图描述他们所目睹的由增长极限而导致的全球生态问题,认为这一概念适用于全世界的人口、资源和环境问题,意指一个时代中出现的重大的、可能出现恶化的关节点。申言之,“大转折”这一术语意味着与当前的地球紧急状况相关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社会转型。“大转折”的提出也由此论证了可持续发展的客观必要性,以及假如允许资本逻辑继续支配资本主义社会,必然会威胁所有现代人(Homos sapiens,包括许多其他物种)的生存。据此而言,资本逻辑造成了气候的急剧变化,即将越过“为人类提供安全生存空间”的边界。随着全球变暖进程的加快,世界范围内的碳排放量仍在持续上升。显而易见,资本主义社会未能实现碳减排,资本积累系统存在着巨大的危机。尽管从世界历史的视域来看,资本主义萌芽在世界历史进程中非常必要,因为曾经作为创造性的、历史性的体系而存在着,也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言:“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sup>[5]</sup>但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以资本过度积累为基本特征的系统性危机,与此同时,资本逻辑造成了气候的急剧变化<sup>[1]</sup>,使得地球生态系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恶化,即将跨越“人类安全生存的空间”边界<sup>[6]</sup>。众所周知,人类无法预测历史的实际进程。历史变革唯一确定的是存在着推动历史前进的矛盾斗争永远存在,突变不可避免。因此,人类的历史出现周期性波动,接着面临革命性的加速。面对当下的生态问题,我们需要认真解读和审视海德格尔“现代技术”概念。在海德格尔看来,现代技术“它也是一种解蔽……解蔽贯通并统治着现代技术……在现代技术中起支配作用的解蔽乃是一种促逼(Herausfordern),此种促逼向自然提出蛮横要求,要求自然提供本身能够被开采和贮藏的能量。”<sup>[7]</sup>

① 马克思指出:“这一时期还有这样一些特征:禁止金银外运法令的废除,货币经营业、银行、国债和纸币的产生,股票投机和有价值证券投机,各种投机倒把等现象的出现以及整个货币制度的发展。资本又有很大一部分丧失了它原来还带有的那种自然物品的性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5页)。

② 马克思指出:“在17世纪,商业和工场手工业开始不可阻挡地集中于一个国家——英国。这种集中逐渐地给这个国家创造了相对的世界市场,因而也造成了对这个国家的工场手工业产品的需求,这种需求是旧的工业生产力所不能满足的。这种超过了生产力的需求正是引起中世纪以来私有制发展的第三个时期的动力,它产生了大工业——把自然力用于工业目的,采用机器生产以及实行最广泛的分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5页)。

因此,从人类文明样态的历史演进看,生态文明是农业文明发展的更高阶段,因而也具有某些与农业文明的类似之处。换言之,当我们去理解生态文明时,东西方农业文明甚至原始文明的文明与自然理念,在今天是具有借鉴意义的。比如,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的“天人和諧”理念,也反映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所奠基的共同的价值观:人如何看待和对待自然。中国古代思想家“天人合一”的思想,强调人与自然的完整性。人类作为地球母亲的一部分,必须尊重自然。人类不是自然的主人,不能转变和征服自然。相反,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平等与和谐的。因此,人类应该理性、公正地对待自然。人类应该追求的不是无止尽地违背自然规律,无限制地积累物质财富,而是要接受并尊重自然的价值。如果尊重自然和遵守自然规律是某种生态正义的话,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所具有的价值也包括社会正义;换句话说,尊重人类权力的同时应该公正地分享自然资源。生态正义和社会正义相辅相成,形成了生态文明的价值基础。因此,不可狭隘地地从文化维度理解生态文明;这是有限的、不全面的价值观。生态文明强调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类应该尊重自然,遵循自然正义的原则。行为的规则、所有的人类活动都应该充分尊重自然法则,人类应该寻求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在广泛的意义上说,生态文明不仅包括人类尊重自然的价值和与自然的共存和发展,还涵盖了基于共同价值和治理系统生产模式、经济基础。这一社会文明形式涵盖理应所有社会的物质和精神成果,促进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实现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全面、持续的人类发展、社会繁荣。

据此而言,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不是生态伦理学意义上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也不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是马克思所明确阐释的“人与自然的感性对象性关系”。当马克思不再把人和自然界的实在性问题作为真正的哲学问题,而是去把这一实在性的问题转换成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问题时,马克思的哲学所能讨论或者必须讨论的首要问题就是:这种关系是何以可能的。对此,马克思明确地把这种可能性归结为人类的劳动活动。因而,我们看到:其一,正是在劳动活动中,自然界才成为人的自然界,人才能在自然界中直观自身,自然界就是人本身的存在。反观中世纪,“一个等级,只要它能佩剑,就成为自由的了。在游牧民族那里,有马就使人成为自由的人,成为共同体的参加者。”<sup>[2]232-233</sup>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私有财产关系仍然是共同体同物的世界的关系。”<sup>[2]183</sup>因为,这里的“共同性只是劳动的共同性以及由共同的资本——作为普遍的资本家的共同体——所支付的工资的平等的共同性。”<sup>[2]184</sup>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共同体的意义,还没有达到对自己的内容漠不关心和完全自为地存在的地步,就是说,还没有从其他一切存在中抽象出来,从而也还没有成为获得自由的资本。”<sup>[2]173</sup>其二,正是在劳动活动过程中,在自然界成为人的自然界的过程中,人才成为“类存在物”,即成为社会存在物。基于人类劳动而发生的人与自然界的对象性关系,同时也就意味着人与人之间对象性关系的生成,即意味着人类社会的诞生。如此一来,我们就能够更清晰地理解马克思在对创造概念的改造中何以会发生一个看似突然的逻辑跳跃——因为在对话中讨论的不再是人和自然界的实在性问题,而是它们的生成问题;同时,我们也就能够更清晰地理解在这一逻辑跳跃中所发生的哲学领域的转向——既然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同时就是人类社会或世界历史的生成,或者反过来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sup>[2]196</sup>,那么对人类社会的生成及其发展规律的研究,自然也就成为新哲学区别于旧哲学的特定边界或领域。



#### 四、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自然观的理论创造

众所周知,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货币从金本位的轨道脱离。货币成为法定的货币,它毫无内在价值,完全依靠政府的信誉在流通。货币制度的“双重锚”在历史上第一次变成了“单一锚”,金融自由化与金融创新获得了制度空间。金融自由化与金融创新为何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出现呢?究其根源,借助于信息技术的发展,以虚拟形式存在的闲置货币可以很容易地被转化为金融资产,创造利息收益,同时承担对应的风险。由于这种转化变得十分有效率且便捷,货币就没有理由继续作为财富的储藏手段,而被另一个专业化的领域所取代,即(狭义的)金融。这大大激发了人们对金融服务的需求。金融创新促进资产流动性的提高,从而发挥其“准货币”的职能。这导致了一系列过去不被认为是货币但功能又近似于货币的金融资产的出现。

中国现代性的发育既得益于资本逻辑和技术进步,但同时也深受资本逻辑和技术主义、人类中心主义、价值通约主义等的困顿,并日益凸显出严重的生态问题。从本质上看,超越中国所面临的生态危机,也必须从作为深层根源的工业主义自然观的变革入手。中国当前的自然观也正处于由工业文明自然观向生态文明自然观的转型阶段。尽管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不仅开始得较晚,而且一度进展缓慢,但也程度不同地表露出工业主义自然观和工业资本主义的现实病症。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大跃进”以及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工业学大寨等等都是在学习工业化的进程,而且在这一过程中坚信人定胜天,而对于工业化进程的模仿所造成的后果便是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土壤、水流的侵蚀,资源退化,生态系统失去平衡。自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和工业化进程,试图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的道路,从而规避西方工业化的生态后果;同时,中国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对生态文明、生态经济学的研究,就是针对工业化过程中已经出现的生态问题所做的初步反思。在那个阶段,中国还没有面临高速经济发展带来的能源消费以及工业化带来的高污染,那时生态退化还是可逆转的。但是,这一研究与呼唤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伴随着40多年来工业化进程的高速推进,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越居世界第二位,但是生态问题也愈发尖锐。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生态环境问题;随着国人生活水平的提升和对更高生活品质的追求,如果我们不能有效控制工农业污染、改善环境质量、保障食品安全等,这个问题就可能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以至于成为一个政治问题。在生态自然观和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的科学探索和现实实践,必将意味着中国人的思想智慧,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对人类历史的重大贡献。

概而言之,“五大理念”各有侧重、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一个逻辑严密的理论整体。那么,究竟应当如何科学地理解“五大理念”理论内涵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当避免几种不恰当的理解方式。第一,就“五大理念”本身做孤立的解释。这种理解方式看似高度凸显了“五大理念”的创新性质,但是实际上切断了“五大理念”的理论谱系,把“五大理念”变成了一个在理论基础上无所依托的孤独的存在。实际上,我们应该看到,“五大理念”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科学发展观的发展与创新,而且具体地统一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执政理念、统一于“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统一于“三大发展战略”“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统一于“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共同构成开辟未来发展前景的顶层理论设计。第二,就其中的某一发展理念来理解“五大理念”的整体性质。比如,由于“创新发展”位居“五大理念”之首,就不恰当地过分突出创新驱动的重要地位,仅仅从创新发展来解读“五大理念”;再比如,由于“共享发展”是“五大理念”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过分强调公平公正地分享发展成果的重要性。这种仅仅从“五大理念”中的某一理念来

理解其他理念的偏颇性质,是非常明显的错误;作为一种非常明显的错误,它的发生实际上反映出论者在如何看待与评价我国40多年来发展成果与发展格局上的价值偏好和基本立场。因此,从学理上合理处理“五大理念”的整体性关联就成为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第三,就“五大理念”中的每一个理念做无差别的对待。这种做法看起来重视每一个发展理念的不可缺失的地位,但无差别的对待其中的每一个理念,实际上变相取消了“五大理念”在总体上的重要定位。只有把“五大理念”看做一个有差别的统一的有机体,才能真正赋予它在整体上的重要性。

### [参 考 文 献]

- [1] 陆雪飞,鹿红英.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历史逻辑与理论问题域[J].世界哲学,2018(06).
- [2]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4]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16—426.
- [5]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6.
- [6] Johan Rockström, et al., “A Safe Operating Space for Humanity”[J]. Nature, 2009, 461, no. 24.
- [7] 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下卷[M].北京:三联书店,1996:932—933.

(责任编辑:闫卫平)

##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ough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Human Civilization Patterns

LU Xue-fei, ZHANG Li

(School of Marxism, Jiangnan University, Wuxi 214122)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the community of lif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is the logical continuation and contemporary expression of Marxism’s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ceptual objects of man and nature”, in which Chinese wisdom contributes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world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and global ecological governance. At present, China is actively opening up the possibility of a new civilization type (beyond modern-capitalist civilization), promoting global ecological governance and worl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responding to the western “meta-narrative”, so as to eliminate the “ecological threat theory”, to build a “Chinese narrative”, and to conspire to build the global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s a great power.

**Key words:**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cological community; digital capital